

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道精神

杨剑龙

在反思批判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语境中，基督教文化成为批判儒家文化传统的思想武器，诸多曾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作家在救世精神的推崇、爱人如己的描写、自我价值的追寻中，使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人道精神，对入道主义在中国的萌动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 入道主义

作者杨剑龙，1952年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1920年，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周作人认为近代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和希伯来的思想，他说“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并认为“近代文艺上入道主义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他指出“《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國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國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以周作人的观点考察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我们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中蕴涵着的人道精神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换言之，基督教文化使中国现代文学中更加具有人道精神，这促进了入道主义在中国的萌动与发展。

—

“五四”时期，在反思批判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语境中，西方文化成为针砭中国传统文化的工具，进化论、泛神论、个性主义、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弗洛伊德学说、现代派艺术等等，都纷纷被介绍进国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各取所需地以西方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也就同样受到重视，成为批判儒家文化传统的思想武器。“五四”时期，陈独秀曾经充满了热情地说：“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

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①基督教文化成为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拯救华夏民众重要的文化资源,使诸多曾经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宗教色彩,从而洋溢着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注重救世精神、突出爱人如己、追求个人价值的人道色彩。理性、科学、民主成为20世纪人道主义的特征,成为关注人的本性改变人的处境的人道主义的根本。

虽然,中国儒家文化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有着原始的人道色彩,但是在总体上却更多地呈现强调君臣父子的伦理等第,强调个体的人在伦理体系中的服膺与责任,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轨迹中的伦理道义,在完全不平等的伦理体系中对于个人的自由与关怀被忽略了,在强调道德责任的家族血缘文化中对于个人的尊严与权利被弱化了。德国学者孔汉思在谈到儒学与基督教的区别时认为:“儒学和基督教里,人道主义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都是爱人。”“儒学里,爱人始终指向自然的情感和家庭关系及国家关系。……不可否认,儒学的爱人也超越了狭义的家庭,从爱自己的父母、子女、长辈推及爱他人的。但是,这两种爱之间有等级程度的区别。与之相反,对于耶稣,所有的人——如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的寓言——都可以成为邻人,成为我的邻人。耶稣希望能超越亲人和陌路,本教友和异教徒,志同道合者和持不同见解者之间的血和肉的区别。爱自然不能理解为体验到情感、征服了热情、或是永久的占有,而是无私的、主动的善意和尊重他人。这样的爱应施及邻人,他是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②儒学的爱是家族的、伦理的,是有等级程度区别的,基督教的爱是超越一切的、无私的、无等第的,人道主义在基督教文化中更为彻底更为全面。

瑞士神学家巴特认为:“福音神学几乎统治全线,就其全部表现形态和方针而言是宗教性的,因而是人本学性质的,在这一层意义上可说是人道主义的。”^③他从人本学的视角观照神学,从而突出神学的人道主义内涵。美国哲学家科利斯·拉蒙特指出:“《新约》的道德观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的生活的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部分存在于不朽的王国。……不过,这些福音书中有许多东西可以提供给任何一种襟怀宽广的、高尚的道德哲学。它们中间贯穿着一种激进的民主精神,一种深重的平等主义情感,而正是这些东西激励着无数为了让这个尘世间的人类过得更幸福一些而努力工作的人们。耶稣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代表了广阔的人道主义理想,诸如社会平等,发展利他主义,人人皆兄弟,以及世界和平。”^④他强调《圣经》中激进的民主精神、深重的平等主义情感而呈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显然与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等第、伦理、道义等

^①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7卷3号。

^② 孔汉思:《基督教神学的答复》,见《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112页,第118页,三联书店1994年8月版。

^③ [瑞士]巴特:《上帝的神性和人性》,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第65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6月版。

^④ [美]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第11页,第48页,第4-5页,第169页,第4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完全不同。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谈到以儒家文化规范下的旧文学时，说：“我们所以不满于旧文学，只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他，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①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旧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执著批判的。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认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和平的东西，统应该排斥”。周作人还指出：“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人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②周作人提倡的人道主义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似乎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某种联系。

二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少人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冰心、许地山、老舍、庐隐、闻一多等都受洗皈依过基督教，张资平、郁达夫、林语堂、徐志摩、陈梦家、萧乾、胡也频等曾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鲁迅、胡适、茅盾、郭沫若、曹禺、艾青等从《圣经》中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常常呈现出或浓或淡基督教文化的色彩，流溢出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基督教文化中，基督耶稣是爱的化身，他对于众人的拯救成为其唯一的事业，基督在中国现代作家心目中成为一位牺牲自我拯救民众的伟人，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成为最为生动最具有震撼力的场景。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常常生动地描写基督的形象，突出其牺牲自我对于众人拯救的人道色彩。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通过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受尽凌辱倍遭摧残复杂心理和深刻痛楚的描绘，表露出对那些为之奋斗却戏弄摧残基督的人们的悲悯与诅咒，突出了为民众谋福音而遭迫害的精神界战士形象。冰心的诗歌《客西马尼花园》、《骷髅地》再现了基督被捕钉上十字架的情景，前者为基督赴死途中在客西马尼花园独自祷告时的情景，突出了基督祈祷时险恶的处境；后者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情景，突出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受尽凌辱的情形。徐志摩的诗歌《卡尔佛里》以看客的俗白对话勾勒了耶稣背着十字架赴死的情景，将法利赛人的奸诈残忍、犹太的虚伪险恶、耶稣的博爱坦然都予以生动的描绘。茅盾的小说《耶稣之死》叙写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因后果，突出了法利赛人的阴谋、犹太的背叛、耶稣的博爱。朱雯的小说《逾越节》演绎了基督在逾越节为众人舍生被钉十字架的悲壮场景，细致地刻画耶稣赴

^①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② 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

死时的心态。端木蕻良的小说《复活》以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视角,展示了耶稣在逾越节夜晚即将赴死前的复杂心态和死而复活的情景。艾青的诗歌《马槽》、《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前者演绎出耶稣在马槽降生的情景,突出在困苦中玛利亚的坚毅和执著,她告诫耶稣“今天起/你记住自己是/马槽里/一个被弃的女子的儿子/痛苦与迫害诞生了你/等你有能力了/须要用自己的眼泪/洗去众人的罪恶”。后者展现了耶稣被出卖钉上十字架的情景,以独白式的诗句传达出耶稣临刑前的苦痛和拯救众人的博大胸怀。

虽然中国现代作家们在演绎耶稣故事时着眼点不同,但是他们往往都将基督视为一个精神界战士、一个具有博大胸襟的伟人来看待的,他们大多更为关注基督身上人性的光辉,而较少注意其身上神性的因素。冰心就曾说:“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体’、‘复活’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①基督精神已经成为诸多中国现代作家拯救民众的典范,为救赎众人而被钉上十字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献身事业的象征。因此冰心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丧掉生命的,不能得着生命。’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所以释加牟尼,耶稣基督,他们奋斗的生涯里,注定的是永远的烦闷!”^②老舍说:“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和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③艾青干脆在诗歌《笑》中说:“我们岂不是/就在自己的年代里/被钉上了十字架么?而这十字架/决不比拿撒勒人所钉的/较少痛苦。”对于基督形象的刻画,对于基督精神的推崇,拯救民众、拯救祖国,以基督的献身精神博爱姿态去努力去奋斗,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人道精神的一个方面。

三

美国哲学家科利斯·拉蒙特认为:“《新约》的信条可以给人道主义提供许多一般的、有关人道的道德观点。耶稣反复讲到的社会平等、人人皆兄弟以及世界和平等等,正是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他的一些教义,包括《山上宝训》中的教训,其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将永远激励着人道主义者和所有其他的人。”^④基督教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强调爱人如己的爱。基督告诫人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乃是

^① 冰心:《我入了贝满女中》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76页。

^② 冰心:《青年的烦闷》,《晨报》1921年6月29日。

^③ 老舍:《双十》见《老舍文集》第14卷第265页。

^④ [美]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第11页,第48页,第4-5页,第169页,第4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①基督要求人们除了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了。詹姆士·里德认为：“在基督的心中，爱意味着关心他人，意味着把他人当作人来尊重，而不是把他人当作物来看待，意味着尊重他人人格上的神性。”^②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常常着意描写爱人如己的爱，在平等中尊重他人、在怜悯中关心他人、在无私中帮助他人，使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浓郁的人道色彩。

儒家文化在严格的等第制度限制下，人与人在本质上就体现出不平等，而基督教文化仅仅强调人与上帝的差别，而人与人之间是绝对平等的，耶稣所训导众人的爱也是建筑于抛开了穷富、智愚等一切差别的。许地山的《缀网劳蛛》中的女主人公尚洁是一位虔诚基督徒，她“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底精神去安排”。对待翻墙入内摔坏腿摔伤脑袋的窃贼，尚洁阻止仆人对他的殴打，叫下人将他抬进屋里让他躺在贵妃榻上，尚洁亲自为窃贼清洗伤口包扎伤口，并对大惑不解的仆人说：“一个人走到做贼的地步是最可怜悯的……”还说：“若是你们明白他的境遇，也许会体贴他。我见了一个受伤的人，无论如何，总得救护的。你们常常听见‘救苦救难’的话，遇着忧患的时候，有时也会脱口地说出来，为何不从‘他是苦难人’那方面去体贴他呢？你们不要怕他的血沾脏了那垫子，尽管扶他躺下罢。”在一位富家主妇与受伤窃贼之间，已经没有了等第差异，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怜悯、关心与救助。冰心的《最后的安息》描写了富家女惠姑对乡村童养媳翠儿的关心，来到乡村别墅消夏的惠姑结识了翠儿后，十分同情她的遭际关心她的处境，教翠儿识字、给翠儿食品，惠姑帮助翠儿一起在河里洗衣服，“她们两个的影儿，倒映在水里，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从她们的天真里发出来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合在一处，造成了一个和爱奇妙的世界”。虽然翠儿最后在婆婆的折磨下躺在惠姑的怀中含笑离开了人世，但是小说所呈现出的冲破了贫富智愚差别充满同情怜悯的爱，明显带有基督教文化的意味。庐隐的《余泪》描写了为了爱而牺牲自我的修女白教师的形象。由于战争，修道院门前的大槐树上挂了具无头尸体，修女白教师深为上帝的子民们的残杀而伤心，她决意上前线担当上帝的使者，“用基督的名义唤醒他们罪恶的梦”，“因为基督吩咐他的门徒，爱他们的朋友，和爱自己一样”，虽然最终她在战场饮弹而逝，但她盼望人们以爱人如己的精神相爱而勿残杀，却充满着人道精神。巴金的长篇小说《田惠世》刻画了一位充满爱心的基督徒田惠世的形象，他从基督的教诲中获得爱的启示，他赞赏基督关于人们应该彼此相爱的教义，“他更勤苦地从事工作，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帮助人，爱人，尤其爱穷人”，虽然在投身抗战过程中他动摇了宗教的信仰，但是田惠世爱人如己的作为显然是受到基督启示的。郁达夫的《南迁》刻画了一位心灵深受伤害渴望得到同情与安慰的伊人，他在生活的折磨中精神与肉体都深受摧残后，由牧师推荐来到了安房半岛基督徒 C 夫人海边的住所疗养，在《圣经》中寻求慰藉，与病友同病相怜，他阐释“心贫者福矣，天国为其国也”的教义，说：“这种人抱了纯洁的精神，想来爱人

^① 见《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7-40 节。

^② 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第 163 页，三联书店 1984 年 5 月出版。

爱物，但是因为社会的因习，国民的惯俗，国际的偏见的缘故，就不能完全作成耶稣的爱，在这一种人的精神上，不得不感受一种无穷的贫苦。——他们在这堕落的现世虽然不能得一点同情与安慰，然而在将来的极乐国定是属于他们的。”伊人的遭遇与向往充满着对缺乏爱的现实世界的不满，充满着对于爱人如己的爱的追觅与期盼。人人平等，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关爱，关心人体贴人爱人如己，这就是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人道精神，也是如上作品中所具有的价值取向。

四

美国哲学家科利斯·拉蒙特将人道主义视为成熟人的哲学，并说：“我们不应当不公正地要求对最终胜利的预先许诺。但是，人道主义哲学虽然承认人类可能失败和永久地失败，却相信人类拥有排除万难争取成功的能力、智慧和勇气。”^①在《圣经》中，常常设置基督的门徒们历经坎坷与磨难，却始终保持着对于上帝的信仰，在对于人们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过程中肯定人的权利和价值，使基督教文化在洋溢着生命的愉悦生活中体现出人本主义的魅力。

中国现代作家也常常在作品中深入地描述人们在经历磨难中生命的执著与顽强，从而显示出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寻找个人的价值所作的不懈努力，呈现出人道主义的光彩。许地山的小说常常刻意让人物经历磨难忍受痛苦，从而展示“人性在受窘压底状态下怎样挣扎”^②。许地山的《商人妇》中的主人公惜官经历了“久别、被卖、逃亡”的坎坷遭遇，先是送赌博破产的丈夫去南洋，后千里迢迢去新加坡寻找阔别十年的丈夫，另成了家的丈夫却将她卖给了印度商人做妾，商人死后她出逃中受洗入教，却仍然寻思着去寻找前夫，她甚至认为“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话说：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许地山的《玉官》中的玉官守寡带大儿子，期望儿子将来有一官半职为她树贞节牌坊，在生活的坎坷中她给传教士家帮佣，在主人的劝说下受洗入教，成了一位四处传教的“圣经女人”，却始终难以忘怀贞节牌坊的理想，她经历了儿子参加革命党被捕、儿子出国留学、儿媳妇难产而逝等磨难，却执著地为教会奔忙，为人们所崇敬爱戴，呈现出“圣经女人”的道德人格精神魅力。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中的留学生韦先生与日本女孩相恋，她因怀孕而在乡村住了半年，在基督徒看护妇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并劝说韦先生也走进了教堂，在人物情感的磨难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张资平的《约伯之泪》中的男主人公追求女同学珊珊，珊珊劝他阅读《圣经》，并特别推荐《约伯记》，他便买了一本装帧十分精美的新旧约合本，一篇一篇地阅读。珊珊与高教授订了婚，他失恋后患病回乡间养病，却依然思恋着珊珊。小说以书信

^① [美]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第11页，第48页，第4-5页，第169页，第4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② 许地山：《硬汉·序》，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65页。

体叙写一个失恋的故事，将《约伯记》与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他给珽珊书信的末尾引用了《约伯记》中“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以表达人物悲哀的心境，在情感的跌宕起伏中展示出人物对于生命价值的追寻。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工厂主家独生女梯司朗小姐，因婚姻问题酿成精神病，拒绝看病吃药，整日酗酒赌博。出车祸后，女仆海兰在医院精心照料，海兰却因与小姐都爱上了为小姐诊治的男主人公“我”，海兰为此痛苦而自尽后，小姐准备进修道院，她再三声明说“现在可以治疗她未复的健康，安慰她已碎的心灵的只有上帝了”，小说在人物奇诡坎坷的遭际中显示出人物对于人生价值的寻觅。徐訏的《时与光》中的郑乃顿失恋后成了一个偶然论者，把人生的一切都看作为偶然的，他对一切都采取随遇而安的姿态，否定爱情、否定人生，欲出家做修道士，他在林明默、罗素蕾两个女性之间周旋，被单恋着罗素蕾的男子鲁地开枪打死，他在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探索中投入了神的怀抱。曹禺的《雷雨》在周家的一幕悲剧后，将主人公周朴园送进了天主的怀抱，让他成为了一个悔罪的教徒，他将周公馆送给了教会开设了一家医院，让繁漪、侍萍处于精神永远麻木的境界中，让周朴园在永远的忏悔中打发风烛残年，使剧作在浓郁的悲剧色彩中透露出一种人道境界。

上帝是宇宙的主宰，爱是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强调将上帝爱的阳光普照在一切人和万物上，尤其注重对于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关怀。基督教注重众人磨难中对上帝的信念、对生活的执著，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诸多作品呈现出具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坚强与执著。

五

“五四”前后，在引进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潮流中，基督教文化成为新文化先驱者们倡导改变国民精神的营养，使中国现代文学中洋溢着浓郁的基督精神宗教色彩。虽然，在基督教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也出现不少非人道的、压制人性的因素，虽然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有不少对于基督教文化采取批判姿态的作品：郭沫若的《双簧》、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上帝的儿女们》、老舍的《柳屯的》、《正红旗下》、萧乾的《皈依》、《鹏程》、《参商》等，对于教会的阴暗面、牧师们的丑陋心态等予以针砭，但是他们在揭露针砭中却并不反基督教，并不反对基督教教义。中国现代作家中有许多热诚地推崇基督的救世品格，真诚地倡导基督教爱人如己的精神，强调不畏人生磨难中的人的尊严与价值，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流溢着浓郁的人道主义光彩。

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其道德伦理体系的惯性制约下，个体的人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家族的群体的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于“五四”时期鲁迅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他提出了“立人”的构想。周作人则指出：“中国将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

‘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①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引进与推崇，使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了较为浓郁的宗教色彩，与西方作家沉溺于基督教文化氛围中不同，中国作家往往是为我所用各取所需地吸收借鉴基督教文化，他们常常又将基督教教义与宗教的传奇神迹等区分开来，强调基督教中具有人道精神的因素，而忽视甚至抛弃其中带有神秘色彩离奇意味的内容，以此作为反思否定儒家文化传统的参照物。因此，庐隐曾经说：“在童年的时候，我皈依了耶稣。等到我离开那所教会学校后，我本来不彻底的信仰，便渐渐的趋于破产。当然以耶稣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很够得上人们的崇拜，我就以他为人生的模范，并不算坏。”^②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宗教关系的代表，看重基督的伟大人格，忽略基督的神性，关注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忽视宗教的迷信内容，这使中国现代作家创作中呈现出的宗教意味，在总体上缺乏西方作家创作的深入骨髓的透彻与深刻，常常呈现出浮光掠影式的状态，但是在这些具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作品中仍然具有人道主义的魅力。

有学者指出：“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素，……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③从中国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弘扬，我们可以见出文化与社会互动状态。人道主义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汲取了人类精神文明的诸多营养，基督教是其汲取营养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打破闭关自守面向世界的途中，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汲取与借鉴，显然也是使中国社会涌动着人道主义暖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人道主义在中国的萌动与发展来说，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辛 岩）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

^② 庐隐：《其他·我的宗教》，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89页。

^③ 陈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through utilizing this system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monks by Qianlo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ternal cause(five contradictions) with external cause(four conditions) was the real reason for abolishing i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ight Women of the North Star”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Sinologization of South Star and North Star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ecret Buddhist Sutra

Wu Hui

The sutras of the Big Dipper mainly appeared in Kaiyuan and Tianbao of Tang Dynasty. One of them is 北斗七星念诵仪轨, translated by the Indian Buddhist monk Jin Gangzhi (Vajrabodhi). In this sutra the number of the Big Dipper in title is different from which in the text. And there is also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number of the Big Dipper among the three editions of this sutra. I think it is effected by the Taoism that the translator added the polaris into the Big Dipper. Another sutra is 北斗七星护摩法, translated by the Buddhist monk Yi Xing who is also an astronomer. It is important that Yi Xing described the Mars' Progressing into Nandou and added the horoscopy of ancient China into this sutra. Comparing the canons of Taoism with sutras we can conclude that worshipping the Big Dipper in Buddhist Esoterism was inflected by Taoism.

On the Christian Culture and Humane Spirit in Chinese Modern Writers

Yang Jianlong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rospecting and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the Christian culture become the ideological weapon to criticized the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Many Chinese writer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hristian culture, in their works, they praised saving spirit highly, described the scenes of love others just like love themselves, pursued self-value, which made their works present either many or few humane spirit and it take important effect in humanitarianism's spout and develop in China.